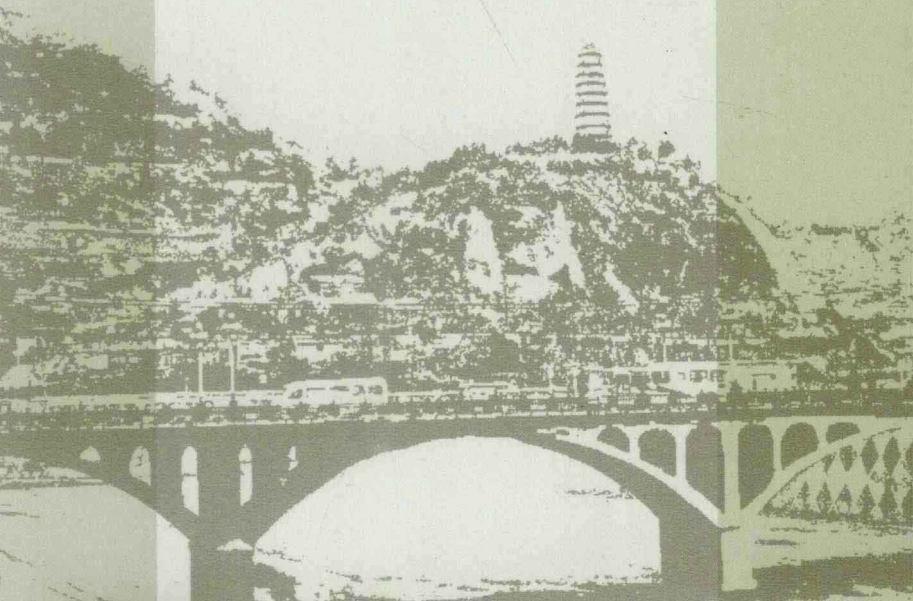


(试用本)

备选课程教材

(党史党建类)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编



备 选 课 程 教 材

（ 党 史 党 建 类 ）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编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材编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 张保庆

副主任 杨士秋

委 员	张保庆	杨士秋	王晓安	陈存根
	白阿莹	郭春和	杨军发	付建成
	郑永强	王中新	薛引娥	胡致本
	余华清	刘国元	刘 敏	王禄林
	王振亚	梁星亮	高尚斌	

目 录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
一、西安事变的概况	(1)
二、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转换和决策调整	(3)
三、中国共产党为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而努力	(5)
四、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善后中积极维护和平解决 的成果	(6)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性影响和主要启示 ...	(10)
延安时期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14)
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4)
二、实事求是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的思想原则 ...	(17)
三、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 的主要根据	(20)
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制定和实行政策与策略的 根本目标	(23)
延安时期党的国际战略与世界眼光	(30)
一、延安时期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31)
二、延安时期党的国际战略的形成与基本内容	(32)

三、延安时期党的国际战略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38)
“三三制”政权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	(43)
一、推行“三三制”是抗日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次重大改革	(43)
二、“三三制”政权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46)
三、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53)
南泥湾大生产与艰苦奋斗精神	(57)
一、艰苦奋斗是革命战争年代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根本法宝	(57)
二、正确理解艰苦奋斗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60)
三、艰苦奋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61)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67)
一、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67)
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	(74)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84)
后记	(89)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①

一、西安事变的概况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1.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日甚一日，中国人民开始了十四年（1931—1945）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其中，1931年到1937年为局部抗战时期，1937年到1945年为全民族抗战时期。抗日救国成为当时中国的历史主题、政治主题。

2.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大政党，虽然对日本的侵略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示，但都背离或偏离过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中共当时因王明“左”倾错误占统治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位)。特别是执政的国民党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从而酿成了长期内战和综合国力的严重内耗，加深了民族危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3. 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其策略方针也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从国民党五中全会开始，蒋介石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也缓慢地发生变化，并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中共秘密接触谈判。谈判未获成果，蒋介石又加紧在西北部署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

（二）西安事变的原因、性质和目的

1.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主要原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思想与蒋介石“安内攘外”国策的尖锐对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对张、杨及其部队的成功争取；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力推动。

2.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因此，西安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反蒋起义和革命，也不是政变，而是“兵谏”，是“逼蒋抗日”的正义之举。

3. 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及多次讲话：“对介公为最后之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他们的目的只求救国主张实现，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并“置生死毁誉于度外”，“是绝对纯洁的”。

二、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转换和决策调整

（一）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国内外动态

1. 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在西安被拘押后，南京统治集团一时间意见不一，大体形成两派：一是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的武力讨伐派；一是以宋氏兄妹、孔祥熙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由此，宁陕道上，刀光剑影与樽俎折冲纵横交织。

2. 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十分复杂：完全支持张、杨，同情张、杨或完全站在南京一边的均为少数，大多数则持中立态度或两面取巧。一般而论，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抗日的。

3. 民众的态度也很不一致：张、杨辖区内的民众及各地的一些左翼民众团体表示支持张、杨义举和主张；有的爱国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表示支持八项救国主张，但对扣蒋行动持异议；一些右翼团体、报刊和知识分子则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拥蒋和攻击张、杨的浪潮。

4. 西安事变在国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苏联（还有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亲蒋反张的立场，但主张双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问题；英美关切蒋的安全，并向南京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日本初取静观、“监视”方针，继则反对南京与西安妥协，企图阻挠和平解决的进程。

（二）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和决策调整

1. 西安事变爆发前，南京与西安张、杨的矛盾上升，中共则从矛盾漩涡中脱身而出，成为南京与西安之间的第三者、

调停者。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制定并坚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毋庸讳言，这个方针的完善有一个短暂探索的过程。

2. 在事变之初，即从12月12日至17日，中共中央曾紧急讨论应变对策（包括13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肯定了张、杨的抗日救国义举，周恩来、张闻天主张“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这就为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明了方向。但当时中共中央决策层因对外界情况缺乏了解而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并带有一定的情感因素，为解决事变设想了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别对待，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这个方案及有关举措（如“除蒋”、“罢蒋”、“审蒋”等）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几个月前已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于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就成了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

3. 经过短短六天的反复和曲折，即在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排除了情感因素，认识达成一致，决定放弃“除蒋”、“罢蒋”、“审蒋”主张，并把对待蒋介石与南京政府联系起来，正式确定了“和平调停”、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这个决策的转变和调整，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理性考虑：一是国内并未形成预想的各方面群起响应西安事变的局面，反而出现了颇具声势的拥蒋潮流。二是周恩来12月17日赴西安后，比较广泛而全面地了解了张、杨的立场、各方的反应以及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三是担心当时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和即将回国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控制南京。四是苏联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

4. 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集中体现

在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两份文件：一是向全国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一是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者凸现了第三者和平调停的角色，向事变双方提出了四项建议，并主张和平会议由南京召集，地点定在南京，明确表示承认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其结果也是有条件地释蒋；后者则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两种前途和中共应持的基本方针做了全面阐述。

三、中国共产党为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而努力

（一）给张、杨以大力支持和帮助

1. 兵谏拘蒋后，中共中央应张、杨之邀，立即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直接与张、杨共商大计，同时从政治上予以支持，军事上予以策应。

2. 从12月12日起，中共中央连电张、杨，不断向他们提出各种具体的建议。

（二）周恩来的调解和谈判活动

1. 12月1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罗瑞卿等到达西安（叶剑英与博古24日到）。当晚及次日上午，周恩来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解释了关于“军事阴谋”的提法，商讨了对付中央军进犯和处置蒋氏的办法，商定了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等，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张后来称周恩来“俨为西安之谋主”。

2. 以周恩来为首的红军代表团深入各界群众，宣传和平方针。除了指示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及党员宣传和平方针，说服群众外，周恩来还亲自对西安方面的中上层人士进行说服，亲自调派干部加强民运指导工作和宣传工作，引导西安事变向全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3. 宋氏兄妹于22日到西安后，周恩来即请张学良转达与蒋、宋谈判的要求，并两次会见宋美龄。23日全天和24日上午，西安三方（张、杨、中共）与蒋的代表宋氏兄妹正式举行谈判。谈判是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的六项条件为基础进行的，达成了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领袖、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等协议；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时也表示，要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当蒋介石下令撤兵后，张学良于12月25日主动陪送蒋氏回宁，西安事变初步获得和平解决。

四、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善后中积极维护和平解决的成果

（一）督促并逼迫蒋介石兑现诺言

1. 蒋介石被释放后，由于挟张学良在手，他的地位由被动转为主动，而张、杨和西安方面则由主动变为被动。继之蒋又扣张不放，并部署五路大军兵压西安，理所当然地引起西安方面的强烈不满和极端愤慨。

2. 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即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推动

蒋介石“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为此，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继续推动各地方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次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公开披露了蒋答应的六项诺言，并督促其实现。1937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蒋的态度仍在动摇中，中共的方针是要争取他，使他与亲日派分离，主要火力应对准亲日派。1月9日洛、毛致周电，明确指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万不得已不得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①此外，为贯彻和平方案，中共中央还接连指示白区党组织，要他们发动和团结各方面力量，迫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停止进攻西安。

（二）维护“三位一体”团结并争取较为有利的条件

1. 从1937年初开始，蒋介石便着手进行所谓的西北“善后处理”，确定西北问题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在具体行动上，用军事压迫手段（即部署五个集团军对西安形成包围、夹击态势），迫使西安就范。为此，1月5日南京制定了“陕甘军事善后方案”；继而蒋氏又将张学良所提两种方案加以修订，即成甲、乙两案，要求西安任择其一。而西安方面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是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这个问题不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

解决，其他问题无从谈起。

2. 在南京、奉化谈判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积极参与了西安方面关于善后问题的协商、决策，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致要求蒋介石释张撤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极力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并争取对西安较为有利的条件。如主张“对乙方案坚决拒绝，对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西安得留东北、十七各一部，东北军前伸到咸阳”等。

3. 由南京、奉化的谈判可知，西北善后的首要问题为是否释张的问题，而根本问题则在于西北地区由谁控制的问题。从蒋介石几次给杨虎城的信函看，西安方面要求张学良回陕和谋求“西北半独立”局面都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蒋介石为贯彻其“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也曾多次“严令前方部队，未下总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至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并曾于1月16日、1月27日正午、1月31日和2月5日四次将和平破裂的时间向后推延。

4. 1月18日，洛、毛致周、博电仍提议“杨、于、孙^①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争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者之实现”^②。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来电批评中共“实际上执行的是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认为“不应当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做出的许诺”。21日毛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即表示：“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

① 杨，指杨虎城；于，指于学忠；孙，指孙蔚如。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3页。

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同时要求“蒋宜给张、杨以宽大”，给红军指定防区、发给经费等^①。

5. 从1月24日开始的潼关谈判，是在西安方面接受并准备执行蒋所提甲案的前提下举行的；所谈问题都是执行甲案中的具体问题，双方已无重大的和原则的分歧；稍后，中共也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经过潼关谈判，至31日，南京方面就实行甲案的有关问题做出一定让步，双方达成协议，东北军即着手从前线撤军。

6. 当此关口，西安方面却发生了少壮派枪杀主和将领王以哲等人的“二·二”事件，立即引起东北军的分裂和内讧。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带领中共代表成员率先赶到王宅吊唁，使王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他致电潘汉年，让其“速告张冲先生转蒋先生，务取宽大政策抚慰东北军、十七路军”。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向杨虎城、于学忠和王以哲家属发出了“同声悼惜”的唁电。为避免更大的流血惨剧，周恩来甘冒风险派人将少壮派几个为首分子送到云阳镇。根据中共中央电示，周决定把在西安的中共人员大部分撤往云阳，他和机要科长童小鹏留在西安。“二·二”事件后东北军接受了不利的乙案，“三位一体”也随之瓦解。

7. 2月4日，周致电洛、毛等报告李克农与顾祝同谈判情况，其中说顾答应“红军只留陈先瑞驻陕南（按此点蒋氏并未同意）余驻陕北”；“善后费五十万，以后每月经费三十万（当时约顾到西安后与周商）。其他各地红军，望我们就地集中，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4页。

由中央供给”。“顾答应我方留一或数人在西安联络”。6日，周恩来等迁出张公馆，搬入七贤庄1号，设立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准备与即将入城的顾祝同进行谈判。8日，南京的第36师和平进入西安，逐步接管城防，“没有表现有挑战行为”。9日，顾祝同入西安，履行西安行营主任之职。至此，西北“善后处理”问题大体结束，西安事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

8. 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性影响和主要启示

（一）历史影响

1.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2.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以中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力量由“非法”转为合法，赢得了在广阔的领域内扩大政治影响和发展壮大的良机，从客观上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二）主要启示

1. 面对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

集体显示了善于驾驭全局、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决策水平。(1) 西安事变激化了西安张、杨与南京的矛盾，却使中共与南京的对抗转趋缓和。中共中央经过短暂的探索过程，排除了主观设想和感情因素，权衡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在时代天平上的比重，全面了解了各方面的态度，正确地判断了当时形势和西安事变的性质及前途，适时地实现了政治角色的转换，制定并完善了和平调停、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2) 从1936年12月13日、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记录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来往电报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既是党的领导层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充分发挥了每个领导成员的聪明才智，其中有过争论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也是正常的，而最终却达到了正确的共识。就个体来说，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的贡献最大。说明当时党内很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非某个人说了算。(3)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不断向共产国际报告事变详情及应对步骤，希望得到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支援”。不管12月16日国际来电是否因电码错乱译不出而到20日重发后才译出，但苏联在其报刊上的言论立场（共产国际与其一致）则无疑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有一定影响。当然，双方的态度有异（前者反张亲蒋，后者赞助张杨逼蒋）也有同（都主张和平解决）。再如，193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放弃西北“半独立”设想，主张劝告西安方面服从南京统一方针，就与国际执委会书记19日来电有关。不应当将中共寻求、尊重共产国际的指导、支持与重视独立自主原则对立起来。可以说，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基本上是中共独立自主做出的决策，中共此时已基本成熟。(4)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尤其

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上下协调一致，不避风险，沉着应对，坚定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运用了一系列机动灵活的策略，既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又以第三者的姿态尽其所能地调停双方，力挽狂澜，表现出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高超的应变能力和斗争艺术。总之，中国共产党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引导、协调和推动的巨大作用。

2. 与任何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团体利益、阶级利益相比，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本质体现。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也是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主旋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关头，为了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顾个人的名位、安危和团体的利益，捉蒋放蒋，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不念旧恶，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即使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经过西安事变关键性的一击，也不得不有所醒悟，做出较为明智的选择。于是，体现高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爱国主义的各种政治力量，终于在相互让步、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凝聚力量，迈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